

外论摘要

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农业

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

——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论制约中国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因素

周 见

经过近十几年的探讨,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值得瞩目的新进展。特别是与发展经济学形成的初期相比较,许多学者不仅重视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的不同之处,而且也重视发展中国家在自然、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存在的多样性,从而促使不少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里,仅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石川滋先生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做个介绍,以活跃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石川分析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和特征

石川分析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在理论上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为源流的。而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点则在于以利润极大化这一现代经营原理为标准,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资本主义部门(以下简称C部门)和生存资料部门(以下简称D部门)两个部门。C部门主要由现代工业为代表,D部门则以近代农业为代表。按刘易斯的论述,在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因C部门的比重很小,劳动力供给的绝大部分不得不由D部门来吸收。但由于土地有限、技术水平低下等因素的影响,D部门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都十分低下,甚至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处于接近于零的状态,因此该部门的劳动收入只能维持在生存需要这一最低水平上。在这种条件下,只要C部门附加若干移动费用,即用稍高于D部门生存水平的工资便可以自由地将劳动力吸引到本部门中来。刘易斯认为这种现象表明D部门存在

着“无限制的劳动供给”,即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只要这种状态不变,C部门就可将工资水平搁置不动,从而充分享受低工资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取得迅速成长。但是随着C部门的这种成长和扩大,雇员不断增加,D部门的劳动力相应减少,边际生产率逐渐得到提高,这样当D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达到超过生存水平之时,利润极大化原理便开始发生作用,边际生产率便成了决定收入变化的决定因素,而D部门的这种变化对于C部门来说则意味着失去了搁置工资水平自由吸收劳动力的条件,即“无限制的劳动供给”已经结束,开始进入有限供给阶段。刘易斯把劳动力市场出现这种转变的时点称之为“转换点”,并认为以这个转换点为起点,C部门已经不能继续享受低工资所带来的利益,工资的提高和工人生活的改善有了可能,因而可以把转换点当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石川对于刘易斯的上述理论,在原则上是给予肯定的。他认为刘易斯理论的前提虽然是古典经济派的生存水准学说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边际生产力论,但刘易斯对国民经济所进行的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结构分析,对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现代部门发展过程相关联所进行的分析,以及用劳动力市场基调的转变去说明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张,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新的含义,而且在实用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他说:“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说明明治以后的日本和二次大战后的南朝鲜、台湾经济的开发过程,也可以用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过程。”但同时石川也指出,由于刘易斯理论及其设计的模型包含着许多近似与省略,因而有其局限性,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尚未达到维持生

存的水平,农业劳动力尚处于大量过剩,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却因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他认为在利用刘易斯理论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过程时,应充分注意到结合各国的具体条件加以补充和修正。石川并从下述方面对此问题给予了具体的分析和回答。

石川认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已经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但当前所面临的最基本的国情仍然是农业部门有限的资源存量,即人口稠密而可供耕种的土地早已接近开发完毕。在这种条件下工业部门的扩大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必然受到农业能否提供商品粮的巨大限制。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转移以前所消费的粮食,在其转移之后也随之全部提供给工业部门。这虽然可以说是刘易斯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条件,但在事实上则是一种偶然。实际上所普遍存在的是“关联漏出”,即随着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部门,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出量开始增加,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也会比以前有所增加,这样便无法保证为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提供与原来消费量相同的粮食供给,也就是说,农业部门的商品粮供给数量的增加,虽然与农业过剩人口转移相关,但并不是按比例增加的,其中必有漏出,所以说那种认为“农业过剩劳动力在转移以前消费的粮食在其转移之后也可以随之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想法只是一种假设,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虽然由于农业部门投资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土地生产量会出现上升趋势。但是,人口也在增加,同时收益递减规律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劳动生产率即使有所提高也十分有限,结果粮食供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需要的状态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价格将上涨,工业部门为确保一个劳动力所需支付的工资也将会增大,这一变化虽然对工业部门的工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实际工资的提高,但对工业部门来说则意味着利润的下降。这样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将受到制约,劳动力需要量也会随之缩小。石川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刘易斯陷阱”,并认为它所反映的因果关系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石川所强调的是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部门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并在理论上将粮食供给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化,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因此可以说与刘易斯理论相比,石川所论具有更为接近于发展中国家实际的特点。

二、石川描述制约中国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的两个模型

石川曾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成长与变动》等著作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的相当高水平的趋势成长率和相当急剧的产业结构变化,几乎在各时期各部门都有所见。但同时工业化过程也因频繁的挫折而不时出现混乱,具有极为不稳定的一面。这样从结果上来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仍属最低之列,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滞存于农业部门,温饱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完全解决,对此石川认为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去寻找原因,但就制约工业化的挫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而论,与他在前面分析“刘易斯陷阱”时所提出的问题基本相符,并从粮食和人口、就业两个方面展开了更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1. 粮食问题及其对工业化发展的制约

对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中国农业,石川曾做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在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采取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形态,但其基础是自给性质的自耕农,而不是推进工业化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成员,而且荒地已被开拓殆尽,因此农业增产的可能性只有依靠更加劳动集约型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灌溉、改良品种增加施肥为基础)来耕种现有耕地。”那么依靠劳动集约型而实现的农业增产效果怎样?对工业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对此石川以中国发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通过绘制的图表做了具体说明。

(1)按图(1)所示,长期以来虽然中国农业土地生产率(粮食生产总量÷耕地面积)趋于不断上升,但农业人口人均劳动生产率(粮食总产量÷农业人口)却几乎没有变化。

(2)按图(2)所示,60年代以后粮食商品率(社会粮食收购总量÷粮食生产总量)虽然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在低水平上徘徊的趋势没有变化。其原因在于图(1)所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3)图(3)表示了全民所有制职工数量的增加与上一年相比的增加率的变化,虽然职工总数在不断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环比增加率经过50年代后期的大幅度的上下波动之后,进入60年代后便出现了停滞趋势。

(4)图(4)反映了工农交易条件的变化。从60年代起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指数开始超过工业品在农村的零售价格指数。原因主要在于粮食商品率低下、

图1. 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
(指数 1952=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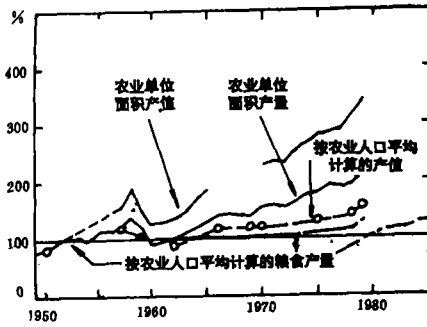


图3. 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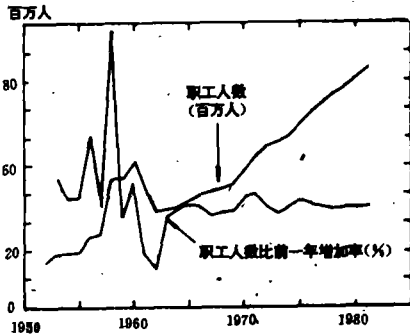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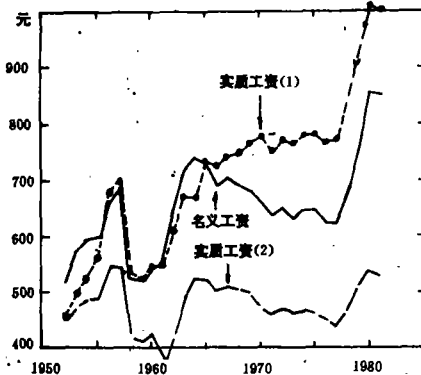


图5.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人均工资



注：(1)为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除以名义工资，即用工业品价格衡量的工资

(2)用职工生计费指数除以名义工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经济年鉴1981、1982》、《中国农业年鉴1980》

图2. 农产品的商品率(按不变价格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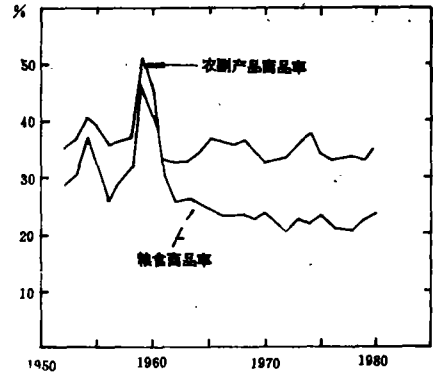


图4. 工农交易条件指数(195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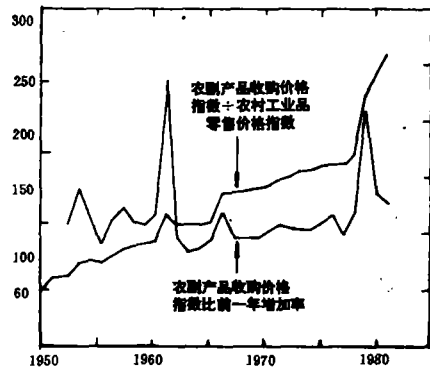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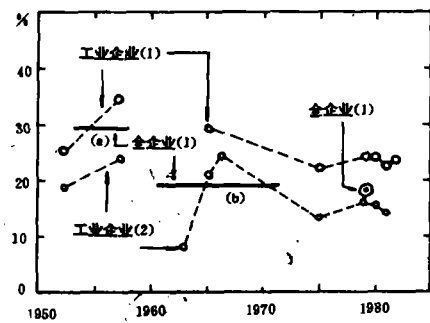


图6.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企业的资金利润率



注：资金利润率等于(利润+税)÷(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资金)或者等于(利润)÷(固定资产净值+流动资金)，前者用(1)表示，后者用(2)表示。

(a)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平均值，(b)为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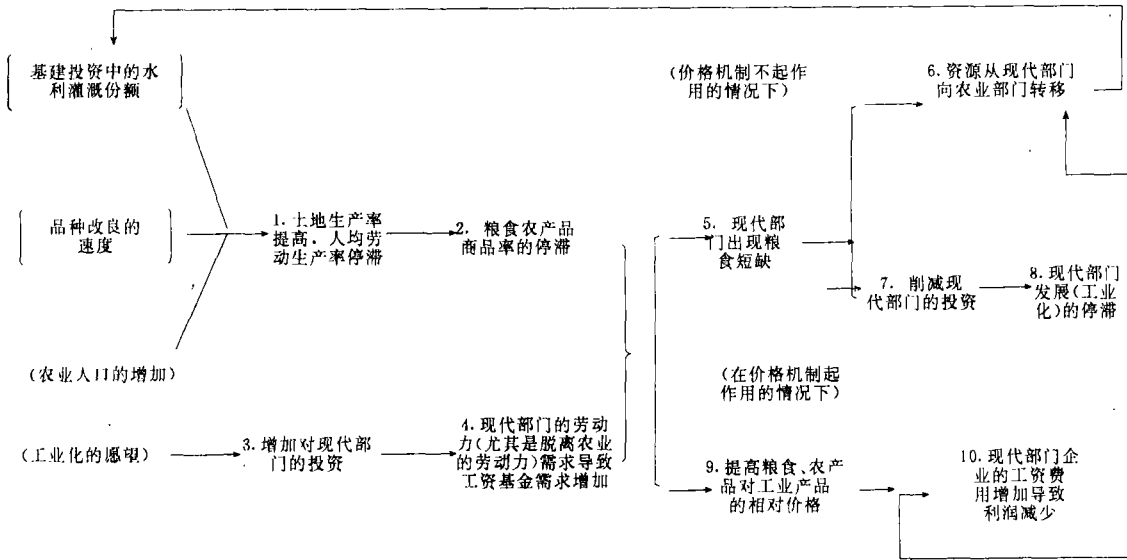
粮食生产成本提高,以及由于职工数量的增加而造成的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结果如图(5)所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从60年代开始直到1978年为止,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都有所下降,而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而言的实际工资(即用其生产

的工业品的价格所衡量的工资)却在上涨,因此如图(6)所示企业资金利润率趋于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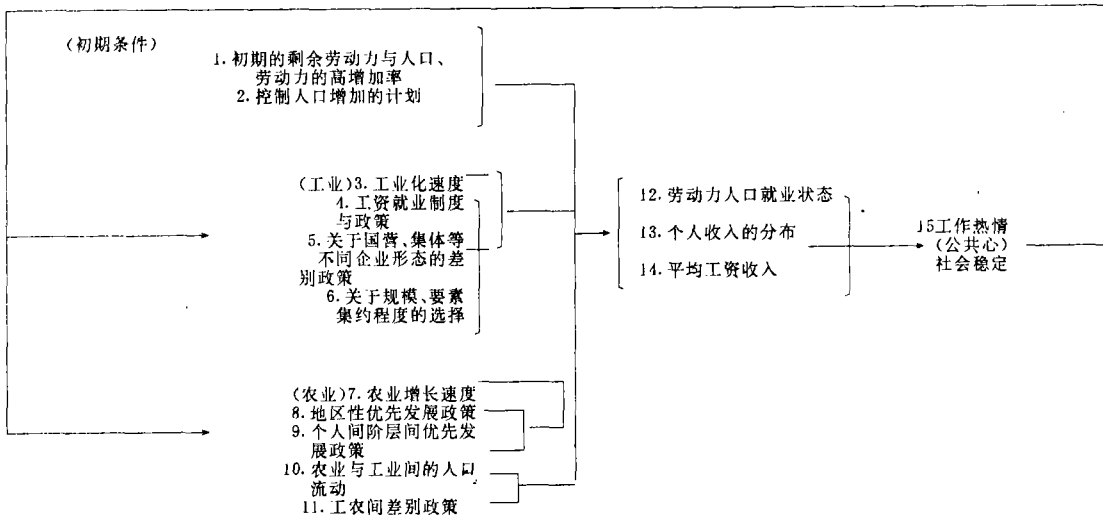
那么,以上图所反映的趋势按因果关系是怎样制约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呢?对此石川利用模型做了具体的描述。

基本因素

发展问题模型——粮食、农业问题的机制



发展问题模型——人口、就业及其变化起因问题



对于该模型所示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机制,石川的说明是这样的:“模型中的①、②表示集约型农业的后果表现为土地生产率虽然上升,但人均劳动生产率(尤其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平均劳动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却仍有可能下降。”“只要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粮食、农产品的商品率也就不会提高。③和④说明无论起于何因(在中国主要由计划性投资),在工业化开始时,生活资料的需求将随劳动力需求扩大而增加,这样当③、④的作用加强,①、②的倾向表现明显的时候便发生了粮食和农业问题,其过程表现为:在价格机制不起作用的时候,首先表现为⑤现代部门的粮食短缺。为了克服短缺,政府采取的办法是通过⑥的反馈来促进农业投资的增加,以促进农业增产。当这种办法不能如愿以偿时,那么只能归于采取⑦的办法,即削减现代部门的投资,结果导致⑧现代部门发展停滞。而在价格机制起作用时,与粮食短缺相反,将出现⑨农产品价格的相对提高。但当其通过⑥不能实现农业增产时,将经过⑩而导致工业化的停滞。在价格机制又起作用又不起作用的混合情况下,⑤乃至⑩以后的发展趋势也将呈现混合状态”。

石川认为上述模型所反映的机制可以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得到清楚的证明。他说,粮食问题和由此引起的工业化停滞现象已在中国出现过三次,即1958—1963年、1969—1975年,1978—1981年,每次的导火线都是计划引起投资率的急剧上升,同时又是靠降低投资率摆脱陷阱的,而粮食问题一直在左右着这一过程的始终,因此中国从60年代开始便不得不把大量进口粮食当作避免工业化停滞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石川还指出,从与工业化相关的人口迁移政策来看,控制城市职工和就业的增加,“文革”中采取的向边疆地区移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跃进后大量向农村下放职工,以及城市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和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也都是以粮食问题的存在为基本背景的。

2. 人口、就业问题及其对工业化的制约

如果把粮食问题作为制约中国工业化速度的上限,那么相反则可以把人口、就业问题作为制约中国工业化速度的下限。这是石川考察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另一个视角。石川认为,中国在耕地面积减少、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工业化吸收剩余劳动力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以及保持社会安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人口就业问题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关联,石川通过下述模型做了具体分析。

按照石川的解释,模型所反映的基本关系主要由①、③、⑦、⑩构成,即当①造成高比率的劳动力供给,而③、⑦引起劳动力需求不足时,就有可能在⑩中出现失业和潜在失业,甚至在⑩中引起社会混乱。但是这一基本联系也受到其它各要素的影响,例如,劳动力的需求分别受④工资、就业制度与政策、⑤国营、集体等不同企业形态的差别政策、⑥对经济规模、要素集约程度的选择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存在几种可能性。例如“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充分就业的制度,就需要采取低工资政策,而在低工资政策下就容易形成工作热情低落等消极因素。但充分就业所带来的政治社会稳定又存在避免热情低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政治、社会的稳定与工作热情不是互相抵消的关系,而有可能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

关于上述模型所反映的机制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石川认为由于有关统计资料还不充分,因此尚不能全面把握,但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直到60年代末,中国人口增长率一直是高水平的,逐年增加起来的生产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已成为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这无疑是在促进向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政策转换的基本动因。

(2)在新增生产年龄人口的压力下,为了尽可能减少失业人口做了巨大努力,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下,对企业形态和规模、要素集约度上的选择采取了极大限制,因此工资制度和政策成了唯一的选择,即“三个人的工作五个人来做”“低工资多就业”,因强调扩大就业而忽视了生产效率,结果人浮于事所造成的潜在失业成了各企业的普遍现象。

(3)“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事实上仍然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这从50年代初、1963—1964年,以及1978年以后三个时期失业或类似失业现象的明显化而清楚表现出来,即其局限性在经济成长受挫时便表现出来,大跃进以后进行的削减城市职工和限制城乡间的人口迁移都证明了这一点”。

(4)在“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下所形成的潜在失业,虽然对防止社会混乱起到了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在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的作用逐渐衰退,而以低效率为代表的消极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

总之,石川认为中国以往选择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在实践中表现为在宏观方面诱发经济增长与在微观方面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矛盾性,从而反映了中国经济机制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三、石川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中期展

望

首先应指出的是,石川在对中国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展望时,非常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去向。他指出,在像中国这样的即使生产总额已相当庞大,但社会效果相对迟缓的国家,以导入市场机制为前提的分权化改革很不容易,但人们已经看到这一改革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因此可以说深入进行改革的基础已经形成。对于上述粮食、人口就业制约中国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石川做了下述中期性展望。

1. 关于克服粮食困难的问题

石川首先强调的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活化农业生产机制上的作用。他认为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和商品粮生产基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当粮食出现短缺时,通过直接增加对农业的公共支出或者间接地通过改善农业交易条件,引进资源向农业部门的转移;而且使生产单位把这些资源当作农业增产投资使用的反映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前这种反映极为消极,而改革后则相当积极,并且在粮食增产和供给能力的提高方面已得到证明。当然这一变化与1978年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整统购统销比例有关。但在缺少使用固定资产积累的地区和生产队里,生产责任制的承担者对货币刺激所表现出的灵敏反映说明在扩大资金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的方面,改革已成为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

在谈及粮食供求问题时,石川认为,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居民的粮食需求量已接近饱和点,中国出现了追求主食质量和副食品多样化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粮食商品化率水平仍然很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粮食增产存在着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对于那种估计到2000年中国将可能完全实现粮食自给的乐观展望应持保留态度。但同时石川也指出,不应忽视改革后中国工业出口的迅速扩大在解决粮食问题上所具有的作用,他说:“只要出口工业的生产还在继续发展,那么在无法只靠改善农业来解决供给的时候,不是没有继续扩大粮食进口来支撑供给的可能性。这时,为了增加工业化的工资基金的供给,将从靠农业维持供给的阶段转向靠工业本身来维持的阶段。这种转变不仅反映在战后的日本,也反映在70年代以后的中国台湾省。”

关于包产到户所带来的问题,石川认为主要在于怎样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来代替过去由人民公社组

织进行的高度集约型的治水、灌溉工程、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购买农机具等共同事业。而这一新的组织在原则上应该能够做到在激发个人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扩大资金从工业净转移到农业的同时,在生产、投资方面有效地开展地区性活动。

2. 关于就业问题

根据中国政府发表的有关生产年龄人口、劳动力人口等资料,石川在展望中国就业问题时态度严峻。他说:“90年代以后,新的生产年龄人口的增加势头将减弱,但由于存在着80年代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和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压力,紧张局面将难以得到缓和。因此,为了增加就业,中国所面临的选择仍然不能摆脱增加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但同时石川对改革后中国从扩大集体、个体经济活动、调整产业结构、引进适用技术等多方面努力扩大就业给予肯定评价,并指出了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为了适应城市新增就业的大部分必须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来吸收的形势,应彻底转变集体所有制比国营企业地位低下的思想,并尽可能缩小或取消在社会保险等物质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和经营条件上的差别。

(2)“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由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引起的对高增长的压力将一直很强烈,能否依靠以增加消费为主的新增长战略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个关键。”这一新增长战略寄希望于将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源泉从增加投资转为增加消费,以此促进农业、轻工业增长率的提高,通过关联效果引起重工业增长率的提高。但是问题在于这一设想能否与第八、第九个五年计划所要达到的增长速度相适应。增加消费的预付资金从哪儿出,并怎样才能维持这种高水平的消费需求,供给方面的可能性如何。

(3)“就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目标而言,引进适用技术的目的在于降低资本对劳动的比率,扩大就业,同时又不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同一产业内,都是生产能力规模越小,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就越低,中国也是一样。这样为了提高中小规模层次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意识地努力进行相应的技术改造。”

(4)在新的农业体制下,城乡之间人口与劳动力的迁移日趋活跃,仅依靠建设地方小城市能否完全造就这种状况,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译介者于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现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